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By ANTHONY J. BARBIERI-LOW.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x, 394pp.**

2007年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秦漢時期的工匠》（*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是首部深入研究早期中國工匠的專著。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於普林斯頓大學師從貝格利研習中國藝術和考古學，其博士論文*The Organization of Imperial Workshops during the Han Dynasty*為本書打下基礎。書名中「早期中國」的時間界定為秦漢兩代，偶爾有必要時回溯到戰國末期。作為一名藝術史和考古學研究者，李安敦從物質文化視角出發，結合勞工史和經濟史，處理了大量支離的物質史料，全面描述了秦漢工匠的生活狀態。

20世紀70到80年代間，美國的物質文化研究逐漸從注重人工製品本身轉變為對其製作者的關注，這也成為當代美國物質文化研究的趨勢。本書的研究重點就是人工製品製作者這一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工」的群體。作者之所以選擇工匠，皆因他認為缺少有關製作者的情境分析就不能完全理解一件物品。其理論基礎是每一個工匠的信仰、價值觀、技藝和動機都是不同的，每一個人工製品的製作者都掌握着各自不同的技術結構，而由於中國古代藝術的模組化和批量式生產，以致「創造」成為了「建造」和「構造」的同義詞。在本書中，作者通過對工匠手中的製成品的研究，希望能理解和解釋製作活動的行為過程和製作者個人的創造才能和生活境遇。

本書的佈局受到柯律格（Craig Clunas）*Arts in China*一書中對中國藝術按藝術品使用情境進行分類的影響，基於秦漢工匠的各種可能身處的情境（社會經濟中、工廠中、市場中、宮廷中、鑛銛中）進行分類。第一章導論開篇以秦始皇兵馬俑和西漢長信宮燈兩種著名的中國文物為例，指出中國古代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這也構成了作者貫穿全書的分析前提。而在此前提下，以往那種界分因美感衝動而創生的飽含藝人情思的工藝和為贏利而製作的工藝的冠冕堂皇的分類將失去意義。這一前提催生了本書的第二章，作者在其中明確了工匠的定義，概述工匠在秦漢社會中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社會對工匠的認識，以及對工匠價值的認定方式。在分析工匠的官僚性質和社會地位時，作者認為「士、農、工、商」中的「工」並不一定是賤民和無產者，現實中的社會流動性、技藝在工匠生活中佔的比重和角色的不同，以及後世史載的春秋筆法都會影響我們今天對「工」的認識，包括如張衡和丁

緩般在宮廷中身兼仕職的工匠在內，工匠在歷史上從來都是失語的、任人塗抹的一群，作者於是意圖通過釐定器物細節和傳世文獻來展示一幅關於工匠的鮮活畫卷。

畫卷逐漸展開，在第三章裡以漆工和墓碑石刻為個案，沿着由產品到製作過程、再到製作者這一途徑，詳述了秦漢作坊中工匠的工作環境、工具、技術、工作量、工匠內部的巫術信仰、遭受的疾患，還考慮到了工匠的識字率問題，通過物品上有關產地和分佈地的信息，包括製作者名字、作坊標記、負責的官僚機構的印章、贊助者的姓名，以及器物將獻予何人等分析工匠製作過程、作為勞動者的工匠的和產品流通情境，並從流傳的神話中離析出工匠的信仰世界和作坊中的潛規則。本章的討論分宮廷作坊和私人作坊兩條線索，且由始至終強調：無論在宮廷還是私人作坊中，都由於面臨各種壓力而必然採用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在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傳世藝術精品中，一件精美的物品實際上並不依賴於良匠的個性，因為宮廷作坊中存在大量的設計模組，大多數人工製品及其創作活動實際上反映的是不同人的創造力和動機。而大批量生產需要熟練的技術和雄厚的財力，於是宮廷作坊的生產組織模仿了朝廷本身的體制，有官員負責監督皇帝的旨意是否在工匠手裡得到嚴格的執行，即生產是否符合標準或者達到規定的數量。作者反復強調，在市場追求利益的壓力下出現的高精度的分工和完善的監督制度已經可以與工業革命後的工廠制度並無本質差別，即從經濟利益出發考慮相關法規的確立、考慮物品的流水線生產、周密衡量勞動力的價值盈損，始終是官營和私營作坊都必須採用的。這也是作者在第三、四、六章中分析的落腳點。作者通過研究漆工來深入描述了生產管理的具體實施過程，然而，由漆器上的針刻銘文發現漆器工藝的複雜性並不由作者首倡。由於早期中國的漆器不是普通的工藝，它與上古青銅器不僅在器型與紋飾上有互通之處，漆器的使用實際上也是與銅器的使用也有相同的政治功效，所以早在國內出土大量漆器時，考古學者們就已意識到一件小小的酒器如「耳杯」，就要經過「素工」、「銅耳黃塗工」、「工」、「髹工」、「上工」、「造工」、「畫工」和「清工」八道工序，還有「護工卒史」、「守長」、「丞」、「掾」和「守令長」等五種官吏的監督，由此窺見漢代官營手工業作坊內部的細緻分工和嚴格管理。這便是作者展示的標準化批量式生產、規模大、工序繁多、分工細緻及所需人數多的工藝生產流程。接着，作者進一步揭示出貌似繁富多變的組合中的內在的刻板規律、工匠們使用的各種精確省力的方法、工匠按照贊助人意願以預製的構件進行組裝，並注意到圖案的精細和複雜性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出現的偏離和受到的損耗。作者在本章末尾特別強調了作坊中的女性，其線索包括秦代石刻中與婦女相關的記載和漢代漆器上針刻銘文中的工匠信息，由此掘出了母放、芒柳、姨縮、大女子驚和令史母夷等上古女性工匠。從絕少的證據中關懷到工匠中的女性這一特殊而又特殊之群體，不失為本書一大貢獻。

在明確了物品和物品的製作者都不能依賴簡單的分類來囊括時，作者就在第四章中討論了市場中行銷技術和工匠地理流動性問題。作者首先引入施堅雅的宏觀區域市場理論，試圖在施堅雅九大分區的啓示下將秦漢工匠的分佈與流動置於六個區塊中討論，在這六大區的基礎上假設秦漢工匠的移動路徑。在討論工匠地理流動性時，作者從碑刻書法風格中強烈的區域傳統與碑文內容入手，判定工匠移動的地理極限是五百公里。此外，工匠在市場中為盈利而使用了各種迄今屢見的手段，如為降低成本而偷工減料、為滿足消費者而仿造宮廷出品、編琅琅上口的歌謠和順口溜，或者烙印作為品質擔保的家族徽標；然而作者憑此斷定秦漢時期的市場就已經具有工業革命之後的市場特徵則值得商榷。

在第五、六章中，作者認為宮廷與民間的界限是模糊的，宮廷工匠實際上涵蓋了處於各種階層和身份的人。作者提出宮廷藝術的「模件紙（pattern sheet）」概念，認為雖無緣得見秦漢宮廷原作，但只須明確模件原則，就能夠從非宮廷出土的墓葬壁畫圖象中攫住宮廷藝術傳遞的影子。接着作者結合經濟史和勞動史，配合碑文、墓葬壁畫和刑具實物，在第六章中考慮到不同任務需要的不同技巧水準、工作的危險程度以及針對由農田中抽取的勞力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的經濟影響，從成本效益的角度分析「卒」、「徒」和「奴」等鑠鑄中的工匠，其意在了解秦漢中國自由和非自由的工匠的經濟價值。即便精美工藝品依賴的是製作過程的精確性和統一性，而這種精確性和統一性勢必導致對工匠進行苛刻的管理，但凌駕於這些之上的還是對國家經濟利益的考量。全書最終的表達還是落在了一個國家駕輕就熟地操縱資源和利用資源的權力上。

在材料使用方面，書中使用的出土史料尤其側重於以雲夢睡虎地秦簡；湖北省張家山漢簡中的算數書也是作者分析作坊中物品製作工序的重要依據。然而，用其中的法律條文來進行文本和物質的連接，進而討論秦漢工匠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將在很大程度上誇大律令的效果，忽視法律條文與實際施行之間出現的各種妥協和變通。又如，作者據工匠墓葬中《周髀算經》和《九章算術》等算術入門書與工匠做工的法規文獻同時出土這一現象推測成

本預算和品質監控的重要性，但隨後卻在沒有秦漢證據的情況下引晉代文獻試圖說明秦漢公、私作坊出品的工藝品都必須標記出處以便接受一道正規的檢查，理由是晉承秦制，這樣的推斷不免有脫離情境簡單對應之嫌。當然，本書的確有不少透過對器物細緻入微、目的明確的分類和觀察後的精彩分析和論斷。如果說李安敦身處的美國物質文化研究經歷了通過物質文化證據來搜集、描述和解釋歷史三個階段的話，那麼國內大多數關於古代物質文明的書籍都還停留於剝離情境的搜集或簡述階段。一件人工製品的意義當源於其與在此前及此後的活動相關的一個連續過程中的位置，由物及人，由物及人參與的社會，這本討論中國早期工匠的專著算得上是一次深入的「睹物思人」的有益嘗試。

何鑒菲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Doing Fieldwork in China.* Edited by MARIA HEIMER and STIG THØGERS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xi, 322pp.**

源自人類學的「田野研究」(fieldwork)近來逐漸受到來自各社會學科和人文學科學者的重視。在《在中國做田野研究》這本跨學科的文集中，來自不同地區國家的學者暢談了他們在中國的田野研究經驗。

Maria Heimer和Stig Thøgersen執筆序言，除此之外全書分成四部份。第一部份「田野調查在研究中的作用」包括Kevin J. O'Brien, Elin Sæther及Maria Heimer的三篇文章。Mette Halskov Hansen, Emily T. Yeh及Stig Thøgersen撰寫了文集的第二部份，主題是「官方中國的裡與外」。第三部份由Björn Gustafsson和Li Shi, Dorothy J. Solinger, Baogang He及Stig Thøgersen的四篇文章細述「資料收集」。第四部份「內外有別」收錄了Bu Wei, Björn Kjellgren, Mette Thunø及Marina Svensson的文章。如果希望能進一步了解田野調查理論，文集最後所附的參考書目還為讀者按圖索驥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書中並沒有對田野研究下具體的定義。正如編者在序言中開宗明義所指出的，編纂本書的目的在於「一是為研究中國的新來者提供參考的框架；二是希望引發研究中國的學者對在田野研究中遇到的問題、處理的策略以及田